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二一期 ——  
(二〇〇八年一月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801b)

---

【专题研究】太阳最红的年代 (讲演录, 下篇一) 辛灏年

---

小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 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专题研究】

太阳最红的年代 (讲演录, 下篇一)

——中共发动文革的谋略与过程 (下)

• 辛灏年 •

插叙: 一个重大转折及其过程——中共十六条的颁布及其所宣示的“文化革命的性质、对象、领袖、主力和闯将”

我现在要叙述一个重大的转折及其过程, 才能根据这个转折过程来讲述中共发动文革的新谋略。

这个过程就是 1966 年 8 月初, 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而也正是“十六条”的公开颁布, 才真正地确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对象、领袖、主力和闯将, 创造了文革的新局面, 突破了“横扫”的旧局面, 策划了文革的新谋略; 既标志了毛泽东的“旗开得胜”, 又开始了文革更加血腥的进程。

一、中共十六条宣示了文革的性质、对象、领袖、主力和闯将

1、中共十六条宣示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应该说, 是“十六条”才第一次正式地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名称, 宣言了这一场“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性质。用它的话来说，就是：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具体的说，就是“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如果我们再把“十六条”里的这两句话和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即1967年11月7日，中共在它的“祖国”——前苏联的国庆节所发表的社论——“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一起拿来“认真学习”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犹如我在前面早已说过的那样，如果没有马列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如果没有前苏联共产革命和斯大林大清洗的血腥榜样，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和刘家党，就失去了一个顶顶重要的和可以公开的革命理由、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倘非如此，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会向世人标明，这不过是又一场朱元璋杀功臣、洪秀全杀同党的残酷内讧而已。因而，也就不可能号召起千千万万的所谓造反派们来来造刘少奇的反了。自然，也就少了万万千千的无辜人民、特别是无辜知识分子的杀身惨祸。因为，那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互相残杀而已，就象几千年中外历史上所出现过的那样，“与民何干”呢？

正是中共十六条所宣示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才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马列主义于“革命理想”之下的血腥本质，才能更加看清共产主义革命、共产党政权和共产党领袖们在“革命名义”之下的虚伪本性和残忍特质……这自然不是我在妄加评论，而是由一部共产革命和共产专制的血腥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至于今天一些在海外搞民运的前造反派朋友们，之所以也象文革中的中共阴谋领袖集团成员——毛泽东、康生和陈伯达等人那样，动不动就要喊出一声“巴黎公社原则”，它无非证明了，要想彻底摆脱社会主义革命的虚假理想、虚假理论和虚假历史对我们的影响，该是何等地艰难……。这无疑是历史酿就的悲剧，罪，并不在这些造反派民运朋友的身上。然而，我们只要愿意读一读“巴黎公社的反动宣言”，只要愿意稍稍了解一下巴黎公社暴动时滥杀无辜的残酷景象，和巴黎公社对巴黎百分之八十民族文化古迹的焚烧和毁弃，我们就能从“巴黎公社的倒退原则和反动原则”即共产革命的原则中，找到中共发动文革的又一个历史源头和造反榜样……至于极少数跑到海外的原共产党毛派造反人士，在他们“纪念”文革四十周年时，仍然口口声声地粉饰“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依然感情尤深地大声疾呼说：“毛是为了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才要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海外文革反思现象，实在是证明了，毛泽东曾为现实和历史蓄意制造出来的一个“文革假像”，非但有人会上当，甚至还有人要以此为毛辩护——当然，说到底，那不过是在为自己昔日跟毛泽东造反的历史行为辩护而已。

我说远了，如果我还想把话说回来，就是如果中共没有这样一个革命的的理论，革命的借口，那么，不论是毛泽东要真正发动的中共文化大革命，还是刘少奇一定要领导的中共文化革命，就都没有发动和领导的任何籍口，即没有任何堂而皇之的理由了。而由中共“十六条”所宣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也不过是这一场内讧对外的“冠冕堂皇”的性质罢了！共产党徒在籍口革命这一漂亮名词而做尽坏事上面，同样堪称是“史无前例”。因为，说到底，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就是一场“革命名义下的疯狂内讧和残酷内讧”。

## 2、中共十六条宣示的文化大革命的领袖

这次会议，终于因为“刘少奇派工作组整了群众的错误”，迫使刘从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落到了亿万人之上、七人之下，退到中共中央“白虎堂”的第八把交椅上去了，所谓“天有二日、国有二主”的局面，立即得以改变，毛的伟大战略部署终于获得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胜利。所以，“十六条”才会公开地、彻底地和毫不讳言地将毛泽东推向了发动和领导文革之独一无二的领袖地位。它的第十六条，也就是最后一条的标题，就是“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在该条中，它还具体地解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它强调：“各

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它总结和预言：“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早已被神化的毛泽东，正在被迅速神化的毛泽东，在中共的“十六条”里又被进一步地神化了起来；已经夺回了文革发动权和领导权的毛泽东，从此成了领导文化革命的唯一领袖和绝对领袖。在这座神像之下和在这位领袖面前，任何人，都只可能成为被打倒的对象，而绝不可能成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就更不用说反对他和打倒他了，这是连想都不敢想和不能想的。刘少奇和刘家党的命运，将只能在“神和领袖”的面前失去一切力量，甚至化为乌有。就不说，自此以后，神化毛泽东已经高潮连着高潮，毛的像章、毛的语录、毛的语录歌；歌颂毛、歌唱毛，表演毛的数不尽的“神曲和神舞、神象和神龛”，全都沐浴着“毛红太阳”那滚烫的光芒，将全中国都在为他屠杀和嘶杀的无边血影，照耀得一片灿烂，更烤炙着无数可怜和无辜的人心，扭曲着无数无知和可悲的人性……。

### 3、中共十六条公布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中共“十六条”明确地向全中国公布了文化革命要打倒的两个对象。第一个对象，如它宣布的那样：“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说，不仅正式地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走资派”政治概念，而且明确地提出了这场文化革命的重点，就是整这些“党内的走资派”。这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共产革命的历史上确属史无前例。因为，即便是斯大林在进行党内大清洗时，也并没有制造出这样一个理论。如我前面所说，斯大林只是找了几个理由，以便他直截了当地杀死政敌；毛泽东却创造了一个堂而皇之的“革命”理论，变着手段来整死他的政敌。为此，他就要借用共产革命原理，发展共产革命理论，运用“共产革命手段”，来证明他之所以决心要打倒刘少奇、消灭刘家党，是因为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大搞修正主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且是人民群众要起来造他们的反，所以他才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理论”，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借以引导和领导他的革命闯将和革命群众起来造反革命——杀刘夺权。也就是说，他要将一场残酷的政治内讧，当作一场历史的“正剧”，来上演给人民和历史看。不仅要欺骗人民，而且要欺骗历史。

正是从此出发，中共“十六条”才会这样宣称：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要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所以，文化革命才需要“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这些话虽然是意有所指，但同样是“堂而皇之”，只不过“撤换走资派和夺回领导权”的革命目的，总算是第一次明确地说出了口，从而透露了毛要又一次“假革命之名以夺权”的真正用心。只不过毛这一次要夺的，乃是党内的大权和实权。

所以，整“走资派”，这才是“十六条”所明确指出的文革第一对象和主要对象，当然也就是文革的“路线斗争”内容，即党内大清洗内容，是“主戏”。

但是，也如我前面所说，为了保证这场党内清洗的成功，就必须制造一个绝对安全的外部条件，也就是在毛泽东于党内进行大清洗时，绝不给人民“真正造反”、也就是“真正造共产党

反”的机遇，他就必须充分汲取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按照自己的需要，再一次地“制造阶级斗争和调节阶级斗争”，大演一场“副戏”，从而使得人民和一切真正有造反之心者，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这就是“制造阶级斗争”，就是用大抓阶级斗争来保护他的路线斗争和保证他的路线斗争的胜利。这当然是所有共产党的拿手好戏，也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毛共“圣经”，在整个文革期间，实在是没有一天不讲、没有一天不喊、没有一天不在制造着痛苦和鲜血的来由。更是中共十六条所明确指出的，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为此，“十六条”就又将已经被批得、斗得、甚至是被打得血肉横飞的“一切牛鬼蛇神”，特别是曾经帮助刘家党反对戚本禹、姚文元的“反动学术权威们”，和所有有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右派分子们，再一次列入了“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的对象。为此，“十六条”还具体地指出，“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还有就是“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以及“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就又把十七年来已经被共产党整过、斗过、杀过不止一次的所有阶级敌人和始终被共产党认为是有问题的人，以及我们的民族历史、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都又一次当成了必须进行疯狂扫荡的对象。马克思的那句血腥名言——“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终于又在中华民族欣遇了它史无前例的得意之秋。

这就是“十六条”所昭示的两大革命对象。第一个对象是走资派，第二个对象，又是无辜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前者是目的，后者是保证。自然，又一场血肉横飞，甚至是更加残暴的血腥杀戮，就要随着十六条的公布，而充满革命血腥地上演起来了。

#### 4、中共十六条宣示的文化大革命的主力 and 闯将

中共“十六条”还明确地规定了文化革命的主力 and 闯将就是“广大的工农兵和青年学生”。

我似乎应该首先说明的是，共产党的虚伪性，就在它要不断地要制造出它的任何行为都是拥有着“人民性和群众性”的，是“人民群众要求、拥护、参加甚至是作为主力军”的。所以，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凡是共产党发动的战争，都是人民战争；凡是共产党发动的任何革命，都是人民革命；只要是共产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一定是人民的文化大革命……。这样，就既可以进行欺骗，又可以制造混乱，更可以用人民和群众的名义来对付他们的敌人，并反过来镇压人民和群众。

中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自然更需如此。但是这一次却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毛要借发动文化革命来清洗他党内的政敌，那他就不仅要在口头上利用人民和群众的名义，甚至要在实际上利用人民和群众的力量。因为，他面对的政敌，是已经攫取了相当一部分党内的实权，甚至是大部份党权的“掌权者”。所以，当他只能寄希望于“以下攻上、以外攻内”之“放手一搏”的谋略时，他就当真要依靠一部份群众的力量，来达成他阴谋夺权的目的了。而这个群众的力量，必须是容易受骗的力量和容易被挑动的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这个力量，也就是被毛泽东认为最容易被欺骗和被利用的力量，就是没有文化或缺少文化的工农兵，特别是一大批出世未久、入世不深的青年学生。而他要的，就是前者的无知和后者的幼稚，一句话——好骗。

我在前面说过，中共在历史上主要就是利用了这两种人。而在所谓的工农兵当中，则主要是利用了他们当中的坏人——诸如被毛泽东称为“最具有革命之坚定性和彻底性的流氓、地痞、

恶棍”（参见1926年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星火》杂志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稿）之流；而不是大多数好人——就是那些老老实实的普通民众——工人和农民等等，才一次又一次地大大地把群众发动起来、也“运动”起来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当派性蔓延、派战激烈的时候，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就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派性最强的，竟主要是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和缺少文化的普通工人和农民，他们的派性超过了中学生；而中学生的派性则远超过大学生；大学生的派性又要比大学教师们强；到了教授和专家们，派性就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了派性，直至反过来蔑视派性或为派性“叹息”了……这可是我当年就发现的“派性秘密”。也就是说，随着知识层次和文化水平的递减，则派性越强，反之则越低。这个现象实在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证明，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的真正关系”——所以，“十六条”才会明确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当然，所谓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是指的就是戚本禹、姚文元这些丧尽了天良的大小知识分子，或流氓知识分子；所谓革命的干部，就是那些不问青红皂白地帮助毛打击政敌、以图往上爬的无耻党徒。但在上述的话里，这两句话不过是共产党惯用的套话而已。十六条所指出的主力，其实就是“广大的工农兵和一大批青少年学生”。而且十六条说，“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越缺少知识的群众，和越幼稚的青年，才会越正确。

然而，毛泽东心里明白，这场大革命要靠的，特别是在“发动期”这个关键时刻要靠的，就是他一心要发动的青年学生。因为，历史上，正是学生运动，才使得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无所措手足——（当然，如果学生运动真的要对付起共产党来，那就要“例外”了！）何况，他们早已为共产党长达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和共产革命传统的教育，“教育好了”；更何况，十七年的造神运动，也早已使毛成了他们的“伟大领袖和精神偶像”。所以，“十六条”才会特别对学生说道：“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之所以如此，一是毛泽东深知，如果学生也互相斗了起来，则文化革命就丧失了它的“闯将”。没有了幼稚青年受骗上当，充当闯将——就是炮灰，文化革命还能否发动得起来，就会大成问题。二是不久，毛泽东已经知道，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因为父母是否“走资派”而出现互斗的现象，全国各地、特别是大、中学校也已经出现了学生斗学生和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情形，如果不及时地予以制止，就会存在着改变文革斗争大方向的严重问题，就是真正的天下打乱，而这个乱，是绝对不适宜他的“乱中夺权”的。所以，“十六条”才会下达这样一条死命令，就是对学生“一律不整”，只是留了一句未来大大地兑现了的后话，“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等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二、中共“十六条”创造了文革的新局面，突破了横扫的旧局面，策划了文革的新谋略

### 1、所谓制造了文革的新局面

简单地说，就是新在确立了毛泽东才是文革的唯一领袖，剥夺了刘少奇领导文革的权力和党内的实权；奠定了文革的革命名义和革命理论，明确了文革所要打倒的两个主要对象；“端正”了文革的斗争大方向，开始逐步实现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从此，在中共党内，由“两驾马车”来领导文革、争夺文革领导权的“暗中较量”，得以根本改变，毛泽东从此实现了对文革的“一元化”正宗领导。

此后，在中共党内，被清洗的力量，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领袖，而且失去了自己的靠山，即便他们要想保护自己，也都必须打着“拥毛造反”的旗号，建立保皇造反派来“自保”了。如此，他们失败的命运已成必然。因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打着红旗反红旗，必被红旗所打倒。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

这就是中共十六条所制造的文革的新局面。

## 2、所谓突破了“横扫”的旧局面

这一部分的内容，我可能要多讲一些。

首先，我要说清楚的是，所谓突破了文革横扫的旧局面，就事实而言，就是开创了文革“横杀”的新局面。

有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正是“十六条”，才大大地突破了文革自人民日报发表“横扫”社论以来，在全中国所制造的恐怖局面，并将它发展到了不但是横扫、而且是“横杀”的“崭新恐怖水平”。

这个例子就是：在六、七两个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中，曾被共产党封为中国语言大师和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因在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整杀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所有政治运动中，均充当过“积极分子”，所以，一九六六年的七月，也就是人民日报的“横扫”社论已经把全中国“横扫”得鬼哭狼嚎的时分，他还在上海得意地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他认为，这又是一场专整别人的运动，不会整到他，他甚至还会做一回“积极分子”。可是，不过一个月之后，当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公布之际，包括老舍在内的北京文化界名人——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以及中国“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等三十多人，均在伟大革命首都的骄阳烈日之下，遭遇了首都红卫兵们的拳打脚踢，鞭抽棍击，一个个被打得鲜血淋漓。当那个从延安来的革命女作家——草明，指着老舍告诉红卫兵们说“他就是反动作家老舍”时，一个女红卫兵便立即举起手中的军用皮带，当头向共产党封的“人民艺术家”——老舍，猛地抽去……，当晚，老舍大概是因为突然之间，感到了“哀莫大于心死”吧，因为他知道红卫兵是毛支持的，于是就抱着他那本通红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书，在太平湖自沉而死……

历史的事实是：就是在“十六条”公布的日子，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在转眼之间就将六、七两个月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地、甚至是发了疯似地推向了“公开逼杀和公开屠杀牛鬼蛇神”的高潮。在上海，不久前，还在“家书”中谆谆教导他那个叛逆的儿子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的著名翻译家傅雷，就与他的妻子双双悬梁自尽在家中；在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大院，“社长吴冷西等一批‘走资派’则被揪到五楼大礼堂，任由‘造反派’强迫他们跪在台上，围着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原文艺部主任陈笑雨在遭遇殴打斗争时虽“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唇紧闭……”（《人民日报回忆录》336页），事后，他便自沉在玉渊潭清澈的河水中，永远离开了这个没有天理人性的血腥人间……。

在全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那些曾为共产党革命造反夺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功勋卓著的“共产派学者文艺家”们，特别是那些在1949年前对国民党蒋介石骂得十分自由、异常勇敢、却又毫发未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如费孝通、史良之流，他们在“十六条”颁布之后，几乎无一能够逃脱文革对他们的惩罚和迫害。由十六条鼓励和煽动起来的“毛主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将他们乱棍打死者有之，逼他们自杀、自裁者有之，用“水火棍”迫使他们从此象狗一样地活在没有自由的牛棚里接受侮辱、改造、批斗者，就更是比比皆是，全国

皆然……而且红卫兵和造反派连死人也不放过：晚清改革派大臣张之洞的遗体、晚清保皇派领袖康有为的尸骨，就被他们挖出来，或在荒野、或被拖在大街上进行批斗；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被埋在八宝山的枯骨，也被红卫兵挖出来，并当着他的未亡人杨之华的面，进行批斗、声讨、高喊“打倒”的口号；曾热切地支持和帮助中共推翻了孙中山所创建的中华民国的宋庆龄，就是“前中华民国国母”，她的父母的尸骨，也被共产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从上海的宋家祖坟里挖出来大大地批判斗争了一番……

然而，在全中国，除掉有名誉有地位的众多专家学者惨遭迫害之外，那些普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甚至只是普通的大中小学教师，就不说“不被造反派们算作人民”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亲属们了，在他们当中，又该有多少个“成千上万”被共产党和毛泽东所颁布的十六条横扫得、屠戮得“冤魂遍中华、血泪浸中原”呢？我的大哥高尔森（退休前为南开大学教授兼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只因为毕业于北京大学、执教于南开大学，年轻时翻译出版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五八年后因受右派父亲牵连，已经被贬到“安徽省芜湖造船厂厂办子弟小学”教书了，却依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遇了八千人大会的批斗和游街示众……然而，他已经算是十分“幸运”的了。因为十三年后，当他乘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春风”，被调回南开大学时，居然是“访旧半为鬼，惊呼已尚存……”！因为他年轻时在南开的同事们，已经有多少还有命挨过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杀”，而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哪些活着的当年同事们，竟然反过来羡慕他在文革中的遭遇，竟然是“最小最小”的……

我似乎特别要说明的是，正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和“十六条”颁布的前后，毛泽东曾一再地煽动他的革命小将们起来造反、革命、杀人，以血腥手段把天下搞得大乱，以便他乱中夺权。为此，在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众多的青年学生代表们；为此，毛泽东竟然放下伟大领袖的身段和“神”的光辉，一再地写信或通过他的“狗仔队”——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带话给他的革命小将们，热情地肯定甚至歌颂他们“公开的私刑杀人行为”。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写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

但是，诚如王友琴所言：“红旗战斗小组”做了什么呢？他们大力推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把学生分成“红五类”“黑五类”和“灰五类”子弟共三大类，把“黑五类”子弟称作“狗崽子”……。

就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就是这个“红旗战斗小组”，和北京城里组织起来的红卫兵们，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名单，开始了抄家杀人。短短的一个八月，就杀害了“黑五类”数千人之多。这还只是在“天子脚下”。至于现在也有前红卫兵或造反派领袖们说，文革中，那些“普通人的死亡”，是“不值得研究”的，好像是“打死活该”，“死得其所”……。我今天就不说了。因为这句话，是否是事实，到底对不对，对于那些枉死在文革中的大批普通灵魂，是不是少了一点起码的同情心，似乎是没有必要争论的。要知道，连专制君主都知道说一句“民为贵”，就不说今天的我们，特别是一些已经成为民运人士的前红卫兵和造反派朋友们了。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呢？是糊涂了，还是怎么了？但愿他们只是想“遮蔽”自身那个红卫兵、造反派群体的“某些历史”而已。如此，我们也只能说一句“理解万岁”了。

至于其余被侮辱、毒打和撵出北京城的更是不计其数。我本人，就在8月31日的北京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亲眼看见一片被男女红卫兵们看守或正在毒打的“花头”。因为他们“不属于人民”，所以，他们必须被赶出北京城……

还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在全中国的成千上万所中学里，旷古未有的公开打老师、甚至打死老师的现象，竟然已经成为中学生们的家常便饭（请参阅王友琴教授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第一个被打死的中学校长，竟然就是“老革命”出身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即“中共皇家女中”的副校长（请观看黄花岗网站刊发的珍贵文革纪录片——《我虽死去……》）。我所在的安徽省芜湖第一中学高三（二）班的同学们，不得已之下，就将我们那个已经被初中部的女红卫兵剃成了花头的女班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林蓉丽老师“请”进教室，专为她演出了一幕批判她的“活报剧”。我坐在下面，强忍着泪水，做出了一副没有表情的样子，因为我就是她被批判的“内容”之一，是她所喜欢的“修正主义的苗子”……。这在中共“十六条”颁布后的全国中学里，已经算是很“文明”的了……，我们这个班在文革中就被批判为“资产阶级集体温情主义”的典型……

因为，毛泽东要支持的是青年学生“造反”者，是敢于斗人、打人、杀人的“红卫兵杀人犯”。毛泽东就是要用“鼓励疯狂犯罪”和“纵容私刑杀人”的办法，来发动青年学生和红卫兵开展文化大革命，并期待他们来帮助自己阴谋夺取被刘少奇和刘家党所已经获取的权力。

然而，问题是，这一切令人发指的罪行，都统统发生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特别是发生在中共的“十六条”公布之后。为了发动和保护这些学生红卫兵杀人犯，“十六条”还一再肯定青年学生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泽东更是为他的小将们提出了完全可以“横行霸道和杀人越货”的理论，这就是文革中人人皆知的八个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因为，伟大领袖早就教导过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当然，造共产党的反，永远无理；造毛泽东的反，永远无理。即便是后来的青年学生敢于如此了（其实八九学运离“造反”这两个字还有十万八千里），共产党的坦克车和机关枪对他们的横扫滥射，却反而变成“有理”了，甚至已经有理了十八年！

“十六条”终于把青年学生变成了革命小将或毛主席的红卫兵。被“御封”的革命小将、特别是红卫兵，更是立即成了毛泽东的“党卫军”和“冲锋队”。无辜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正在被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而刘少奇们要吃大苦头的日子就将来临，一场更其疯狂的腥风血雨就要席卷在我们可怜而又无奈的祖国大地之上。

然而，直至今今天，还有人在说：是“十六条”，才把群众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解放了出来，才使得广大革命群众开始敢于造起走资派的反来了……，这显然是极少数前造反派人士为维护自己的文革行为而在公然地向历史撒谎。因为，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十六条”，它的唯一“德政”，就是为利用和煽动青年学生造反革命，而不准许斗学生和学生互斗，并出于毛泽东的政治需要，而将几个曾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青年学生解放了出来，让他们带头去造反。如北京那几个“根正苗红”的学生造反领袖——蒯大富、韩爱晶之类。除此之外，正是十六条的颁布，才将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真正如中共十六条所宣称的那样，变成了文化“大革命”；才将自六月一日起已经开始“横扫一切”的中共文化大革命，推向了“造反有理、杀人无罪”的新高潮，才将文化革命的三字经“斗批改”从此改变成为“斗批杀”，而且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于刘少奇的“资反路线”这一文革政治观念，究竟是什么时候才由毛泽东和他的文革阴谋领袖集团制造出来的，我在后面将要详细说到。因为，自八月初“十六条”颁布到十月四日整整两个月间，这个文革政治概念还根本没有被毛泽东“搞”出来。

### 3、所谓策划了文革的新谋略

就象我在前面讲到毛泽东伟大战略部署时所说的那样，这个伟大战略部署的某些谋略，是毛早已就阴谋策划好了的；但这个伟大战略部署的另一些谋略，却是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地被阴谋制造出来的。如果说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使得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



夺取了一次极其关键的转折性胜利，甚至可以称之为“旗开得胜”，但是，由于刘少奇只是在党中地位下降，还远没有彻底垮掉，若要中共党徒和全国民众立即领会毛要打倒刘少奇的本意，并高举起“打倒刘少奇”的旗帜，还很不容易；由于刘家党在中央和各地的势力还没有崩解，他们甚至已经转而竖起“拥毛造反”的旗帜来“保刘”、特别是“自保”；而毛泽东又是旨在非整死刘和非清除刘家党不可，否则，他就不能安然地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变成他自己一人的“党主专政”……；所以，如果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是毛泽东的胜利，但这一胜利非但还没有尘埃落地，甚至还要遇到想像不到的复杂局面和艰难前程。这就逼迫着毛泽东，非得在旗开得胜的基础上，重新调整自己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可。正是这个调整，才又制造出了此后的一系列阴谋谋略，为将中共文革从全面发动期顺利地推向全面夺权期，一步一步地奠定了政治基础。

下面，我要讲的，就仍然是中共发动期的谋略。只不过，它们都是出现在“十六条”颁布之后了，是为了实现“十六条”，而出台的另一些“新谋略”。

我还是按照中共发动文革的谋略和过程的顺序，来继续地讲下去。

## 第七、以号召“四大”打开发动文革的新局面

今天的年轻人，大约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在文革中所号召的“四大”了；今天——除掉极少数极少数前“造反派头头们”以外，大约也没有什么人会津津乐道共产党所号召的文革“四大”了；今天，还要把共产党在文革当中号召的“四大”——这个曾迫害和逼杀了无数无辜中国人民、特别是无数无辜知识分子的中共阴谋手段和杀人工具，当成是“自由和民主”来歌颂的人，即便是在前造反派人士中，怕也只能是“凤毛麟角”。历史已经把它埋葬了，虽然，它的幽灵鬼火尚在。

为了简单地追述共产党在文革中号召的“四大”——这样一个“阴谋政治现象”，而不是“自由民主现象”；为了通过对什么是共产党号召的“四大”的了解，来认知共产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认知它不过是中共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阴谋谋略，我以为有必要将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内容和决策，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目的和功能，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范围和手段，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政治效果和政治本质，和中共在文革“四大”的历史命运，向大家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和说明。

### 一、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内容和决策

“四大”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来自1957年共产党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来路，是在反右斗争中，虽由知识分子首先发起，却转而迅速被共产党利用，从此成为共产党号召党人和群众用贴大字报的方式批判斗争和迫害知识分子的工具。

（参阅辛明：“四大中的一大——大字报”，黄花岗杂志第21期）其结果是，在共产党蓄意“号召鸣放”和决策“引蛇出洞”的阴阳两谋之下，盖因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只知阳谋而不知阴谋，完全是善意地响应了共产党的号召——短暂地鸣了，放了，贴了大字报，进行了大辩论，而使得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其中更有很多被判处劳教、劳改甚至改判为反革命分子而枪决——如北大女学生林昭等，从而逼使千千万万个人家破人亡。并从此在中国，将自辛亥之后中国人民早已经拥有的所有发言权、舆论权和思想权，继1949年以来的历次镇压之后，全面彻底地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中国从此绝对地成了共产党的一言堂，中国从此便绝对地要“言必称马列、书必证马列、事必奉马列”了。一个来自外族的反动思想，从此成了共产党统治中国人民的绝对统治思想；中国从此人人都必须做“马列子孙”，而不敢再做“中华儿女”；中国人从此连死了，也只能和必须去向马克思报到了！一九五七年，只因重庆中学的邓祐曾老师在“鸣放”中说了一句话：“中国有五千年灿烂文化，为啥还要立一个大胡子洋人作祖

宗？”邓老师就被打成了右派，并被迫害至死。从此之后，凡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有谁敢于做“中华儿女”、而敢于不做“马列子孙”呢？

到了1966年6月1日和2日，自从共产党的“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这样两篇社论之后，再加上北京大学被阴谋制造出来的第一张所谓马列主义“大字报”，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全国就开始出现了以聂元梓为第一人的“造反派”。于是，曾在1957年之后销声匿迹的“大字报”，便突然铺天盖地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它们的矛头直接地和毫不留情地指向着“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文化人和广大大中小学无数的无辜教授、教师们，岂但是卷起了一片风声鹤唳，而且是杀出了一片淋漓鲜血。虽然大鸣、大放只是虚话，真正的大辩论更不可能出现，但大字报，却已经作为“四大”的先锋，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套杀人武器”，开始横行在正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中国大陆。

这之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他“贴”出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正式地提出了，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于是，这个指向极为明确的“四大”，才正式欣逢了它的第二个命运之春，中国人民也才遭遇了它们的又一次可怕浩劫。但文革中的“四大”和反右中的“四大”略有不同。反右中的四大，始为先进知识分子所用，后为共产党用来打击、迫害、捕杀先进知识分子；文革中的四大，则纯为共产党阴谋制造和公开发动，其目的就是要要把被“红太阳”视为生死“内敌”的刘少奇、刘家党以及一切牛鬼蛇神，都要“批臭、斗倒、整垮、逼死”。必须特别说明的是，凡是要被“四大”“批臭、斗倒、整垮、逼死”的共产党，都必须是“红太阳”要打倒的，而不是任何人所敢于打倒的。这是一个绝对的前提，丝毫违反不得。造反派们充满革命激情高喊的“敢把皇帝拉下马”中的“皇帝”，不过是“真共产皇帝”毛泽东要拉下马的“假共产皇帝”刘少奇及其党羽而已。

此后，中共颁布的“十六条”，又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字报，郑重其事地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四大”终于作为中共文献所决策、所规定的发动文化革命的重要手段，被轰轰烈烈地号召起来了，而它的对象，也被中共的文献规定得清清楚楚，就是毛泽东所要整的共产党的“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于是，自“十六条”颁布，“四大”正式被共产党号召，全中国立即因为它而陷入加倍的残酷批斗和血腥迫害之中。

## 二、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目的和功能

我先说目的

“四大”既然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号召的革命方式，是中共文献规定的革命手段，那么，它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被用来“点火”，即制造“革命舆论”。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已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所以，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聂元梓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就是毛泽东的阴谋小组织所一手策划和制造的。而也正是这一张大字报，就立即在全中国掀起了发动文革的疯狂舆论，点燃了文化革命的毒焰。此后，在全中国，几乎各地各级各单位都有人利用“四大”，特别是和主要是利用“贴大字报”的方式，来点燃本地区和

本单位的文化革命毒焰，制造在本地区和本单位发动文革的舆论。甚至在整个文革期间，上至毛泽东，下至一个最小的造反派头头，无分哪一派，他们都曾为了大造革命舆论，而充分地或阴谋地利用过共产党教给他们的“四大”工具。可以说，没有“四大”，就没有了文革的发动，就没有了文革的声势，就没有了所谓的造反派，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在文革中被害死和逼杀。

它的第二个目的，则是被利用来公开打击政治对手。毛泽东正是用贴大字报的方式，炮打了他所要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且起到了号召他的闯将和主力军炮打刘少奇和刘家党的巨大作用。此后，在文革期间的全中国，凡是要打击自己的政敌者，当然主要是共产党和他们的各类造反派们，在遵命攻击和打倒某个对象时，“四大”往往就成了他们的第一套武器。有时，只需要贴一张大字报“鸣一下和放一下”，他们的对象，就有可能跳楼的跳楼、投河的投河、服毒的服毒了。所以，在文革中，得意的造反派们才会称大字报就是“精神原子弹”，它的作用可以想见是多么地巨大和可怕。

现在说到功能。

从总的方面来看，“四大”，就是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革命所最早使用的武器，也是最普遍的武器。特别是在文革的发动期，由于毛泽东的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是当权者，他们没有政治力量和舆论能力来造“牛鬼蛇神和走资派”的反，所以，他们就只能在“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的公开号召和阴谋策划下，用“四大”来对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发动进攻。但对毛泽东及其发动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来说，正是“四大”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功能，才使它成了毛用来达成他实行“以下攻上、以外攻内”和“放手一搏”的重要工具。具体地说：

首先，它是路线斗争的工具。因为，对内，美其名曰：毛泽东要搞的是路线斗争，就是实行对党内的政治大清洗。由于党权大部分被掌握刘家党手中，所以，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和搞垮刘家党，就必须利用革命群众和幼稚青年帮助他“以下攻上和以外攻内”，即“诱民攻党”。毛泽东当然不能也不敢发枪发炮给他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他当然只能将他曾胜利地使用过的“四大”这个工具交给他们，以点火、揭发、煽动、批判、斗争、直至高喊打倒他的政敌们，以造成是人民群众才要打倒刘少奇和刘家党这样一种“革命政治现象”。这样，毛打倒刘少奇和搞垮刘家党，就不过是“顺应民心”罢了。在文革的全过程中，特别是在运动的发动期和夺权期，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的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和造反派们也都是这样做的，并且大功告成。

其次，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如我前面所说，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为了保证路线斗争的胜利，就必须一如既往地和更加厉害地“制造阶级斗争和调节阶级斗争”，以造成一个“一切阶级敌人和一切牛鬼蛇神都不敢乱说乱动”的外部局面，以保证他对内发动的路线斗争不受干扰和破坏，更不能因此而给“真想造共产党的反的人”以任何可趁之机。更何况，他那种要先搞得“天下打乱”、然后再“乱中夺权”的政治谋略，又必须是“乱中有治”的。乱谁？就是搞乱刘家党，搞得他们感到大祸临头，却首尾、左右不能相顾。治谁？就是治得老百姓服服贴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绝对不敢真造共产党的反。而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他就仍然要借助于“群众专政”的力量，而所谓群众专政，就是由他的革命群众——文革中就是共产党的各色各样造反派，来帮助他实行专政。而造反派实行“群众专政”的重要工具，并且是具有挑战性和恐吓性的工具，就是“四大”。拥有着丰富群众专政经验的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就正是在运动的发动期，首先策划和利用了聂元梓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然后再在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号召下，号召革命人民纷纷贴大字报揭露、批判所谓的“一切牛鬼蛇神”，在全中国，将共产党无数无辜的“阶级敌人”——早已没有了土地的地主，早已经无地无钱的富农和资产阶级，和一直在被专政、被劳改着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还有大

批的普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人，推向了血腥之路。而普通民众，自然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还敢乱说乱动呢？诚如文革中我们那里的民谣所唱的那样：“不用枪，不用炮，只要一张大字报，保你吓得要上吊！”

再者，它还是打击特定政治对象的残酷武器。也就是说，毛泽东和共产党，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地各级各单位领导和工作组，甚至包括红卫兵团体和造反派组织，只要他们决定了必须打倒或攻击某个人物、某种势力、某个集团，甚至包括某些造反司令部、造反队及其头目，他们往往所使用的第一手段，也是“四大”，特别是在“四大”中挂帅的“大字报”。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亲自运用“四大”为武器，在党中央贴出了“炮大司令部”的大字报。毛泽东要搞垮旧上海市委，搞掉刘少奇的线上人陈丕显、曹荻欧，他就派聂元梓到上海去串联红卫兵和造反派们首先干的，就是贴陈、曹的大字报，用“四大”来向他们发动进攻。中央文革的阴谋领袖们，特别是江青，只因为她想搞掉上海滩那些知道她底细的三十年代电影明星们，她也是先派人到上海去贴他们的大字报，揭露他们的风流丑事，搞臭他们再迫害他们……。可以说，在文革中，可谓无人不怕大字报，因为，他常常是遭遇攻击和迫害的前奏。特别是那些有来头的大字报，即那些有来头的“四大”。这样的例子，在文革中实在是数不胜数，甚至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经久不衰。

### 三、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范围和手段

就范围来说——

中共在文革中号召的“四大”，它们都是具有明确的范围的。如前所述，毛泽东和“十六条”都曾公开的宣称：“四大”就是用来批判和斗争“一切牛鬼蛇神的”，并且是只准许按照共产党和毛泽东规定的范围来进行的。因为一切被共产党专政的，和即将被共产党专政的对象，都是丝毫也没有运用“四大”的权力的。“十六条”就明确地规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党的阶级路线”；文革中颁布的“公安六条”，则明确地规定了那些没有任何资格参加文革的阶级敌人；随着文革的发展，则是不成文地规定了所有路线斗争的对象及其败将，他们根本就谈不上还有什么“四大”的权力；而所谓的“大辩论”，在文革的造反者和被造反者之间，则是根本就没有辩论的可能——因为，不论是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在文革中已经倒台的“革命派”，或已经被抛弃甚至遭遇了镇压的造反派，都是没有任何可以参加辩论的权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早已告诉他们，他们全都“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就不说，在文革中稍有“异议”的人了：遇罗克仅仅是对共产党极其反动和史无前例的“血统论”发生了怀疑而已，就被逮捕判刑直至枪决；刘文辉倒是用大字报批判了中共发动文革的错误，就被迅速逮捕、迅速审判、迅速枪决，并且连骨灰都不准留下来；后来的共产党员张志新只是要坚持用马列主义理论去批评文革现象，就不仅被剥夺了“四大”的权力，而且被割断了喉管，然后才送上刑场；江西的女青年李九莲只是对文革产生了逆反心理，并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竟然在华国锋时期还被共产党枪决，直至被抛尸荒野，连尸体也惨遭蹂躏……这样的悲惨事实在中共的文革中多不胜数。

就手段来说——

中共在发动文革中号召“四大”，同样使用了“革命的两手”。这两手，就是既要“绝对地控制”，又要“绝对地不控制”。

所谓“绝对地控制”，简单地说，共产党在文革中所号召的“四大”，如我前面所说，其目标和范围是极其明确的，不可越雷池一步，也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哪怕他是“通天”的造反派，也只能绝对听从毛主席的伟大革命部署，永远守住文革的斗争大方向，否则就是“自取灭

亡”。聂元梓、蒯大富及全中国许多造反派头目的悲惨下场，整个造反派所遭遇的“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命运，就是明证。

所谓“绝对地不控制”，则是在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每一个阶段和范围内，面向共产党的敌人、毛泽东的敌人、中央文革的敌人、文化革命的其他对象、无辜的人民群众、无辜的知识分子和“各类分子”，“四大”都可以造谣、诬陷、栽赃、坑害，无所不为。共产党和毛泽东非但不予以任何节制，甚至鼓励、号召和保护一切下流无耻和罪恶的造谣、诬蔑及中伤……这自然也是一个“史无前例”。在这个史无前例里面，遍中国在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四大”逼迫得含羞蒙辱，家破人亡，那就还是让历史来作证，让“天良”来作证了。

#### 四、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政治效果和政治本质

##### 先谈政治效果——

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第一个政治效果，就是确实为中共发动文革、毛泽东实行党内大清洗和保证发动党内路线斗争的外部安全，起到了莫大的政治作用。

1966年6月1日和2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相继发表，就已经使得大字报在全中国铺天盖地起来。所以，不论是中共党的文革史家，还是民间的文革史家，甚至是共产党造反派出身的文革史家，几乎都认为那是中共文革正式开始的日子。反过来说，中共文革正式发动的革命标志和政治标志，就是在全中国立即风起云涌的“革命大字报”。此后，在六、七两个月里，可以说，“四大”，主要是大字报，不仅成了中共发动文革的武器工具，而且成了中共发动文革的成就象征。因为，正是在中共号召的“四大”之下，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用制造阶级斗争的办法，来搞乱外部，稳住外部，以适应实行内部清洗的目的。这就是“四大”的第一个政治效果。

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第二个政治效果，就是毛泽东自己用大字报，向党内发出了他要发动文革整“走资派”的信号。这个信号，告诉给了他的党人们，他这一次是要整顿内部，甚至是要打倒党内的高官和大官们，即他所说的“走资派”。同时，他又用他自己的大字报，向人民宣布，“四大”才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更是人民反对、打倒“走资派”，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武器。他和中共的“十六条”公开为“四大”定了性，公开为发动“四大”作了决策。因此，就前者来说，他就是利用“四大”，将斗争的矛头立即转向了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下子就搞乱了他的“党心”，搞乱了他的政敌，甚至顷刻间就搞乱了政敌的队伍和阵线；就后者来说，则正是利用“四大”，才将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造反视野”，迅速地扩大到了共产党内的革命对象身上。虽然在八、九两个月，这种“革命视野”的扩大，虽有成效，却还成效不大，但却为随之而来的批判、斗争中共走资派的暴风骤雨，作了开拓和铺垫。这就是八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和颁布十六条之后，在全中国，文化革命才正式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批判斗争才发展成为“抄家杀人”的缘故，迫害人民却更要迫害走资派的来由……一句话，就是中共文革因此而“更上层楼”，中共文革将因此而结出“革命正果”……

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第三个政治效果，就是“四大”开始被共产党的各个政治派别所利用，特别是在八、九两个月，全国各地各单位要跟毛造反的造反派，开始试图用“四大”来造“走资派”的反；反之，全国各地各单位那些要保卫“走资派”的，也要高举毛的造反旗帜，却要利用“四大”来“保皇”。由于造反派在拥毛造反的一杆旗号下，出现了各为其主的不同派别（这个主，当然都是共产党），这就为文革“四大”带来了另一个政治效果，这个效果，就是派性的出现和膨胀，就是派战的开始和激化。而派战在没有发展到武斗的阶段时，四大就

成了它最重要的武器。这时，不光是大字报依然在独领风骚，大辩论也已经摆开擂台，只是这个“辩论”仍属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辩论，与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无关，也不可能允许他们参加。所以，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第三个效果，就是因“四大”而导致了派性的出现和迅速激烈化；反之，派性的激烈化，又将“四大”推向了如火如荼的新阶段。

中共在文革中发动四大的第四个政治效果，就是在1966年十月之后，当“批判刘少奇资反路线”的阴谋战略，终于被毛和他的阴谋领袖集团炮制出来之后，“四大”终于如毛所愿地被派到了中共文革的“正面战场”上。从此，“四大”在批判刘少奇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场上，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革命作用”。由北京幕后策划的批判刘少奇阴谋，自然是要用“四大”来首先打开局面；而由各地革命造反派们立马响应的对刘少奇的批判，就更是只能利用“四大”来表示他们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无限忠诚”，和对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的“无比痛恨”……虽然这些造反派自己与刘少奇从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就总体来说，他们不过是要跟着共产党的大皇帝打共产党的二皇帝罢了。

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的鼎盛时期，就是批判资反路线和造刘少奇反的时期，“四大”对于毛泽东终于能够彻底打倒刘少奇和清除刘家党，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刘少奇打倒之后，它作为中共发动文革的阴谋手段，在中共文革的夺权时期以及后来巩固权利的时期，依然是功不可没。当毛要第二次搞掉邓小平的时候，所谓“走资派还在走”的造反派大字报，所谓“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的造反派大字报，还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于后来那些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字报，对于毛泽东和他的“后宫掌权者们”来说，也同样是功劳不小。

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第五个政治效果，可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罪恶效果。

我显然应该说明的是，我刚才所说的文革“四大”的上述政治效果，都还说的是“四大”对中共发动文革所产生的“正面效果”，就是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对他们自己发动文革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然而，我似乎特别应该讲到的是，中共在文革中发动“四大”，对于破坏民族道德、颠覆社会伦理，毁灭正常人性、毒化世道人心所起到的作用，实在已经对我们的好几代人，甚至是我们整个的民族都起到了难以想像的腐化作用。诚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中共在文革中发动“四大”，在政治上虽有严酷的范围，但在道德上却无起码的要求。为了打倒刘少奇，为了清洗所谓的走资派，为了批判斗争一切牛鬼蛇神，一切的诬陷、造谣、栽赃、陷害，非但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大受鼓励和弘扬，甚至连对自己的父母亲人都在所不顾。如此，一切的流氓行为、无赖举动、灭人性和绝人伦的罪恶行径，久而久之，就既深化了共产党的“党性”，又恶化了人民的“个性”，甚至丑化了我们悠久民族的民族性。

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大学》）。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在文革中所号召的四大，对我们民族、国家、社会和几代国民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实在是用得上“罄竹难书”这一句话。因为它不仅对造就恶劣腐烂的社会风气，起到了不可比拟的作用；对形成阴险狡诈的人格，起到了难以想像的影响；而且，对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那些自号“精英”们的身上，所练就出来的“贪婪、虚伪、奸诈和多面人格”的坏品性和坏作风，还有，就是缺少起码的人文修养的种种令人恶心的表现，就更是令人哀之而复哀之。

应该说，今日中国一切可悲和可怕的社会症状和人格症状，都与文革号召放纵“四大”源远流长，关系甚深。这个效果，无疑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和文化的负担，在压迫着我们和我们艰难的追寻。而由这一效果所造就的，当代中国“国民人格和社会文化”的重大缺

陷，实在已经成为共产党直至今日依然能够“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的人民不仅被共产党愚昧了，而且被共产党的文革及其“四大”毒化了。再加上共产党的“腐败腐烂成就”远远地超过了他的“洋务运动成就”，而使得这种愚昧和毒化不仅还在代代相传，甚至还在“发扬光大”。且不说今日中国的社会风气已经败坏到了何等的田地，只说近些年来，我们只需稍稍留心一下海外一些对某种人来说实在是自由万分的中文网站，随便看看一些昔日的造反派人士，或非造反派人士，或不同“出身”的少数民运人士间的互相攻击谩骂，读一读他们用以对付他人、对付无辜者、甚至是对朋友和战友的批判、谩骂、造谣、诬陷的“文章和文字”，我们一定可以从哪些恶狠狠的语言，甚至是恨不能将对方一棍子打死还要“踏上一只脚”的“唯我革命姿态”上——就是批判和斗争的“狠劲”上，看到中共文革及其“四大”留在我们国民心灵上的可怕影响。这不怪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中共文革的受害者或“隔代”受害者；但我们也该有所“自醒”了……因为，为什么直到今天，当我们的一些朋友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前途正在进行着艰苦奋斗的战士时，却依然不能戮力清除文革及其“四大”对自己的恶劣影响，并努力地去提高自己的应有的民主修养、甚至是文化修养呢？

### 再谈政治本质——

我想，我已经到了该说说中共文革“四大”的政治本质的时候了。

可以断言的是，在中共文革中，“四大”，乃是共产党迫害同党的工具，残害人民的屠刀和毁灭“自由民主”的死敌。因为在全体中国人民毫无论出版自由和整个中国社会黑暗血腥得没有一丝亮光的可怕文革岁月里面，“四大”，它的鲜明的政治目的，它的可怕的攻击力量，和他“造谣诬陷岂但无罪而且有功”的无耻下流特征，使它成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用来达到制造舆论以打倒政敌、整杀人民的最无耻的武器和最血腥的手段之一。

1970年的那个除夕之夜，我的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齐健先生，曾和我走在母校冷清得怕人的大操场上。当我们看着远处黑魆魆的小山坡上那一排排无人为之下葬的棺材时——里面躺着的全是因武斗而死的“造反派战士”，他告诉我说：“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没有一个人能够享受到一丁点的自由……”

王友琴在“摧毁日记的革命”一文中曾说道：“现在还会听到有人说，文革时代是‘大民主’，使用‘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群众起来‘解放’自己，等等。这些人的记忆和陈述是真的吗？只要不是白痴，都能明白，使人不敢写日记的环境和气氛一定是非常严厉和残酷的。既然连日记都停止写了，人还有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吗？在不敢写日记的同时，那些写在大字报上的话，会是什么东西，也是很清楚的。”

她的文章明确地用事实告诉我们，1967年，“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就赫然地统计着，仅仅是在1966年8月和10月间，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抄家杀人中所缴获的“私人日记”就有6820本（篇）。文革前、特别是文革中，仅仅因为被发现写“反动日记”而被无产阶级专了政、甚至是送掉性命的，在全中国就更不知有几千几万几十万了……，我本人一生都不写日记，就是这个原因。就不说在那个所谓“四大”的岁月里面，一个孩子只因喊错了一个字，写错了一个字，就成了小牛鬼蛇神（参阅黄花岗杂志第18期“难忘的反标事件”一文），就被造反派押进了牛棚。我年青时在芜湖市文化局的一位同事，也是一位剧作家，文化革命当中，他的13岁的孩子，只因为在喊口号时将“毛主席万岁”错喊成了“刘主席万岁”，就被公安局逮捕并被造反派押送游街批斗了一百多场，终于被逼成了一个少年疯子，而且疯了一辈子。我在1979年写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我的妈妈”（原题是“妈妈的爱”，发表于1979年《北京文学》4月号，转载于《新华文摘》5月号，将重新发表在黄花岗第22期上），就是根据一个小学教师读报时将“刘主席”读成了“毛主席”，而被逮捕判刑直至被迫害至死的

事实来写的。我前面说了，我自己在文革中写下的长篇小说和诗歌，几乎只能在极亲近的同学和朋友中传阅一下，就必须马上烧掉了事，因为一旦被传出去，或被好事的造反派知道，就会大祸临头（参见“逍遥派说文革”一文）……在文革中，这样的事例，实在是千千万万！请问，他们这些人可有一分钟为自己辩论和辩护的权力，我们可有发表一篇不符合共产党统治、文革斗争大方向和“造反派脾气”的作品的权力？就不要说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反对文化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任何一种文字了？就连即将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绝对没有写一张大字报为自己辩护的权力啊！只需要一句“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就已经够了！因为“狗头”都砸烂了，还有什么“四大”可言呢？如此，在中共文革中，则“大辩论”何来？“四大”只能为谁所用？“四大”又怎么可能就是“自由和民主”？！甚至是共产党恩赐给人民群众的“大自由和大民主”？！

至于1966年10月之后，在毛泽东的“造反派”们用“四大”来批判、攻击、斗争和打倒中共党内的“走资派”的日子里面，他们虽然揭露和批判了不少共产党官僚的罪行，对此，确可谓“有功”。但说到底，也还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即毛泽东的阴谋小组织，暗中发动和公开号召他们干的，是为了他们在党内的夺权服务的。就不说他们使用“四大”发动造反革命的对象，也是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规定着明确的范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是举着“尚方宝剑”才敢造的反，才敢造某些“规定对象”的反。对此，我在后面讲到文革造反派的问题时，将会详细地加以说明。

## 五、中共文革“四大”的历史命运

我以为应当弄清楚的是，1975年，中共的四届人大还将“四大”写进共产党的宪法，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毛泽东和他的“四人帮”正在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残余文革”，“四大”对他们仍然是阴谋武器，还有用。我今天就不详细说了。但是，1980年，当共产党面对着79年“民主墙”上的大字报这样一个“民主政治现象”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公开取消了“四大”，同时决定取缔一切新闻出版的自由，陈云就公开宣称“绝不容许别人象我们当年利用新闻出版自由去跟国民党干那样，来跟我们干！对于民办刊物，要全部取缔，一个不留。”（陈云讲话，1980年春）因为，曾被打倒过、又“官复原位”的当年的“走资派”们，害怕没有新闻和出版自由的中国人民，会反过来“利用四大”反对共产党，而绝不是因为“四大”乃是他们所必须排斥的“西方民主”。这不过是共产党说的政治笑话而已！至于1979年为什么会出现“大字报”上墙的“民主墙”，首先敢于贴大字报上墙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为什么邓小平和共产党对“民主墙”先要利用，后要推倒，并由此而废掉了至今仍然为极少数文革造反派领袖们所眷恋的“大民主和大自由”——“四大”，我今天就不讲了。历史迟早都会将一切真相揭开。

但我要说明的是，在全世界所有的民主自由国家，都不曾出现过中共所号召的“四大”这样一个血腥的怪物。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拥有着充分的舆论权和出版权。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无需利用发动群众、甚至欺骗、牺牲群众来达成他们要打倒政敌、以为自己夺取权力的目的。因为，他们的权力是由自由的人民来“做主”赋予的。

至于人民应不应该放弃“四大”的权力，当然不应该。但此“四大”绝不是共产党所号召的“四大”，而必须是与共产党所号召的“四大”绝然相反。因为，只有当“四大”能够作为被剥夺了言论出版自由的人民之真正反对专制制度的武器的时候，它才会回到它原来的自由民主意义之上。然而，人民有心，共产党不许——这便是半个世纪以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酷现实。而当人民有心，共产党也许了，或共产党的专制制度已经被推倒了，那同样也就不需要什么“四大”了——因为，已经拥有了新闻、出版和舆论等一切自由的人民，还要那个侵透着共产党血腥气味的“四大”干什么呢？



## 第八、以“破四旧、立四新”来扫除发动文革的最后文化道德障碍

### 一、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极端反动的政治文化概念——斗争和决裂

我以为，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必须明白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对人类具有致命危害的政治文化概念，或者说是两个政治原理，一是“斗争”，二是“决裂”。所谓斗争，当然是指阶级斗争，并且指“人类的整个一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说，人类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阶级和阶级的永恒斗争。所谓决裂，就是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说白了，就是否定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文化和文明，并用马列所制造的血腥文化和反动文明全面取而代之。所以，由马克思发动的，和由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成功实践的共产革命，说到底，都是在制造两种“背叛”：一个就是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不断地、甚至是持续地制造阶级斗争，以进行背叛式夺权；一个则是批判、否定、割断甚至是毁灭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与文明，就是背叛本民族的传统。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几乎没有一家不是这么干的。特别是前苏联的共产革命成功后，就更是逼迫着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这么干。中国共产党不仅以制造残暴阶级斗争的方式，在中国大陆推翻了曾艰难“走向共和”的大中华民国，而且在批判、否定、焚烧和背叛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明价值上，无疑是又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

所以，凡是要研究共产党的革命和实践者，就必须深深地了解和懂得共产党“革命”的这两个内容及其特性。了解了、并懂得了这两个内容及其特性，再来了了解中共发动的文革，了解中共文革期间为什么会把“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口号喊得特别响亮，实行得更更是史无前例的血腥，特别是共产党和毛泽东为何要在“十六条”颁布之后，还要特别地号召和发动“破四旧、立四新”的原因，就容易得多了。

### 二、“破四旧、立四新”是为了排除传统文化道德障碍，以便号召打倒刘少奇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为共产革命提供了一个“要与一切传统观念作最彻底决裂”的共产革命理论，这就为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号召发动一场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带来了一个现成的“革命理论根据”。而毛泽东之所以要利用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来发动一场“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和清洗刘家党。

因为，刘少奇在一九三五年中共遵义会议之后，就开始为毛泽东管理党务。其间31年，他作为毛泽东的党务总管，全面地掌控了中共的组织大权，即用人的权力，也就是说在中共的党务系统和组织系统，他才是掌握着实权的共产党领袖，其人脉之广泛和亲信之众多，早已造成大权在握的局面。再加上他毕竟早已成为党的第二把手，1959年又因“逼宫”而迫使毛让他当上了国家主席，在名义上已经与毛同样是“真命天子”。如我前面所讲，1959年中共“马列国”的国庆节，他的画像和毛的画像是并举在游行队伍前面的，“万岁”的口号已经不再是毛泽东一人的专利，而必须与他分享。所以，刘少奇也就不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其威信和形象，已经是越来越深入了党心，越来越深入了所谓民心。刘家党更是早已将“毛主席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主席”的话，对内传达到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基层党支部。这是我首先要说的。

再就是，毛泽东虽有“雄文四卷”，“金光四射”，刘少奇却也并非没有自己的理论和著述。他的理论“建树”，就是他的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与毛的“雄文”一样，都被共产党规定为党员的必读书，也是中共的“圣经”之一。特别是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出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理论，即“党的驯服工具论”，不仅成了中共教育其党徒的经典，而且成了党徒必须遵守的法则，甚至在文革中成了党员和群众不敢造刘少奇和各级共

产党官僚反的“紧箍咒”。其对中共全党的影响，实在不能不说是既深、且透，而且具有很大的“压迫力”。尤其是由于刘家党的宣传，党内党外都众口一词地说，“幸亏是刘少奇才扭转了三年‘人祸’饿死人的局面”，就更是在党徒和国民的心中，为刘少奇制造了相当正面的形象。

大家看看，如果我上面说的这两条完全属实，那么，毛泽东要想打倒刘少奇，甚至要彻底肃清刘少奇在党内外、特别是党内的影响，他就不可能不遇到两大障碍。一个就是刘少奇的权力和人脉，一个就是刘少奇对党徒和全国老百姓的影响力，也就是他在共产党员、甚至是全中国大陆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而毛在文革中一再地号召造反派们要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就是因为要打倒刘少奇实在是太难了。而且难就难在，这既是一场号召“以下反上”的运动，要是不能排除刘少奇权利和人脉的障碍，特别是不能排除刘少奇已经形成的“光辉形象”，和由刘少奇的地位和形象所造成的，党员和群众反刘的“心理障碍”，只是简单地发一个号召，说要造刘少奇的反，要打倒刘少奇，清洗刘家党，在实际上非但做不到，而且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要是能做到，毛就不用再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还要共产党、人民、甚至历史，都要承认他打倒刘少奇是正确的，而刘少奇不论是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是“应该和必须打倒”的呢？都是人民和造反派们要打倒他的呢？这就是毛泽东不能简单地发动一场宫廷政变或军事政变以打倒刘少奇，然后再清除刘家党的原因。当然，这就更增加了毛要打倒刘的难度。

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以所谓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错误，而把刘在党内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虽然是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但这并不等于说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了。因为，刘少奇凭着自己在党内国内的人脉、影响和形象，未必不能卷土重来。何况，他只是犯了派工作组的错误，党外的老百姓搞不清楚，党内的高级干部还能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因此，这非但并没有对刘的形象产生很大的破坏性，而且暗中对刘的同情心甚至反而会“看涨”。何况，刘仍然是国家主席，两个月后，他虽然已经在党内公开指明为“最大的走资派”，但是，几天之后，中共的国庆节，还是得让他上天安门，而且还得让他站到毛的身边去“并驾齐驱”，虽然这曾经难坏了那个“弄臣”周恩来……。

正是因为如此，毛才会明确地意识到，一是八届十一中全会还远没有达到打倒刘少奇、清洗刘家党的目的，刘根本还没有“倒”，刘家党还没有开始“清”；二是在党员和人民的眼睛里，刘不过是犯了错误而已，他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三是要坚决打倒刘少奇和彻底清洗刘家党，就必须要有党内的造反派们首先领会他的“倒刘”意图——就是发动这场文革的终极目的，然后还要拥有敢于造刘少奇反的胆量，再就是必须先把刘批臭，否则就是打倒了，也不是真倒，还有翻案的可能……。不久之后，大批特批刘少奇“黑《修养》”、特别是大批特批刘少奇的“党的训服工具论”的批判运动，前者就是要把刘少奇彻底搞臭，后者则是要排除党徒和群众造反的巨大思想障碍，这当然是文化大革命是否真地能够实现毛“倒刘”意图的重要舆论战役。

这才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毛泽东和林彪就紧锣密鼓地发动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的原因。因为，在本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方向已经明确地公之于众之后，惟有号召全党全国、特别是入世不深的革命小将和文化不高的工农兵，从全国范围内先闹起来，并且从民族文化的根子上，从党内秩序的底盘上，将“束缚”着党徒和人民“反心”的人伦道德、传统文化和“共党修养”予以彻底的再批判，甚至是干脆发了疯似地焚烧它一通，才能激发起青年学生和革命群众的造反胆量和革命激情来；才能真正做到“以下攻上”、“以外攻内”“以小攻老”，“以民攻党”，才能造成一派“学生敢打老师，儿女敢揭父母，妻子敢批丈夫，下级敢斗上级”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景象”。否则，这个反就造不起来，也就是“乱”不起来；否则，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贵为各地、各级、各行业和各单位属于刘少奇“资产阶级路线”的党委书记们、行政长官们，就没有人敢去碰他们，更不用说“敢把他们拉下马”了！同时，而也只有在全国都制造出了一派“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气氛和革命

精神，才能迅速地将造反的矛头引导到刘少奇及其全国各地各级刘家党头目的身上。至于这重“背天逆地”的疯狂行为，究竟又会给全中国的老百姓，甚至是他自己的党人，带来怎样的痛苦和灾难，这就不是毛要考虑和愿意考虑的了。“诳骗天下之民众，诱发天下之恶斗，以遂其一人之欲望”——这在毛，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更是他向来不屑为之一顾的。

### 三、中共文革是怎样号召和实行“破四旧、立四新”的？

如果这个道理，我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来看看中共、特别是毛泽东是怎样地号召“破四旧、立四新”的，和文革是怎样来“破四旧、立四新”的。历史的事实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已经提及“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一“革命内容”，但还没有将“破四旧、立四新”当作一场运动来大张旗鼓地进行发动。

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已经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内容。“十六条”明确地说：“……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敢于“以下反上”），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要以“无知”批斗“有知”），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消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文明、伦理和道德），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要让一切都能够适应中共发动文革造反夺权的需要），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以利于毛泽东一心想要的“封建党专制制度”）。在此，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毛泽东要又一次“将马克思的‘要与一切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的普遍共产革命真理，与中共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革命手段了！当然，它所包藏的祸心，就要浮出水面。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学生和教师。林彪在大会上声嘶竭力地号召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在中共完成了为“破四旧、立四新”“大造革命舆论”的阶段之后，终于正式地被中共号召起来了。

1966年8月19日清晨起，北京城就立即开展起了“破四旧”运动。全国闻风而动。自此，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造反革命旗号之下，抄家、打人、形形色色的群众专政、惨无人道的私刑虐杀，甚至公然地杀人——即杀“黑五类”，顿是“蔚然成风”。北京的红卫兵在北京公开打死人，就为我所亲见。前面已经说过，他们在短短数日内，居然就按照北京公安方面提供的“黑五类”名单，公开虐杀了四千多无辜的“阶级敌人”……整个中国已经是一片鬼哭人嚎，一派魍魉世界。然而——

1966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一文，却称北京和各地红卫兵带头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是“创举”。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好得很》的社论，公开夸奖“创举”说：“许多

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在全中国，许多城乡连墙壁都被刷成了血红色，所以文革当中，才有所谓“红海洋”之美称……

正是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号召下，自中国有历史以来，因统治者号召而在陕西砸黄帝陵、在山东砸孔庙、在全国各地把我们中华民族的族宝和中国人民的国宝当作反动的“四旧”来“砸、烧、破”的全国性统一行动，终于成了共产党和毛泽东号召“造反”的又一条战线，犹如“巴黎公社”焚烧巴黎的宫殿庙宇和文化古迹一样，在中国的历史上创造了又一个史无前例！当然，既然共产党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将这一场所谓革命定名为“文化革命”，那么，为了发动和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而史无前例地毁灭我们的文化古迹，文化传统，岂不是完全符合马列“要与一切传统文化观念作最彻底地决裂”的最高原则吗？

一场为共产党、毛泽东和林彪发动及其号召的所谓“破四旧、立四新”，就是这样地又一次“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了；文革造反中因民族文化道德传统所形成的最后障碍，终于被彻底地推倒，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更是并被践踏得荡然无存。一场人斗人、子斗父、妻斗夫、亲友相斗，学生斗老师、甚至是杀老师的文化大革命，一场“以下斗上”、以“无知斗有知”和“以外来邪教消灭中华正统”的文化大焚烧，终于在一场所谓“破四旧、立四新”中，血腥地和疯狂地发动起来了。从而为毛泽东一心要在制造大混乱中，号召和发动“敢把皇帝拉下马”——就是敢于打倒刘少奇和清洗刘家党的一场“人民革命造反”和“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打开了一条“血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文明传统和无数中国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则为中共所制造的这一场疯狂内讧和残酷内讧，作出了可怕的牺牲和无谓的牺牲；直至它所造成的影响，至今还在毒化着我们的世道人心，毒化着那些天天都在攻讦着我们民族和文化的昔日共产党“改革派”知识份子，特别是今日共产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

#### 四、共产党的“破四旧、立四新”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在近年来的马列中国，有一种突出的政治文化现象，就是凡是我们要批判和否定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恶制和恶政时，共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就立即会站出来批判说“中华民族是劣等的民族”；凡是我们要批判和否定坑害了我们几代中国人的中共马列文化，共党的自由派知识份子马上就会挺身而出地批判“中华民族的文化才是愚昧的文化”；特别是我们只要一批判和否定共产党和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和文革”，共产党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就会立即大骂起秦始皇来；今日，竟已经发展到只要有人敢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专制统治和专制卖国行径，共产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马上就会加倍地和咬牙切齿地批判和咒骂孙中山先生才是专制的总根子和卖国的大元凶……；至于我们今天要在反思中共文革的时候，批判和否定中共在文革中发动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他们则早已经把秦始皇“焚书坑儒”罪行，看成是比共产党和毛泽东发动“破四旧和立四新”更加罪恶万分，或者起码是“相提并论”，借以取而代“骂”。

但这样做，却是对秦始皇最大的不公正。

因为，要是将文革的“焚书坑儒、抄家杀民”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比，非但只能使秦始皇望洋兴叹，而且会使秦始皇痛苦异常。因为，秦始皇少了共产党毛泽东杀人的气派，他不过是焚了已经被他灭亡了的前各诸侯国的历史文化典籍，杀了四百六十个亡了国、却又为他所养的前各诸侯国的贵族知识分子——原因是秦始皇反对他们企图推倒郡县制、复辟封建制、恢复贵族等级制度、重新分割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虽然杀害知识分子有罪，但

是他反得并没有错，因为他是在维护“不讲出身、不讲等级、不容分裂和相对进步的新君主平民制度”！他比两千多年后居然还要“大讲成份、出身、阶级”，在文革“破四旧、立四新”中更要唆使红卫兵疯狂地高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共产党和毛泽东要进步一万万倍！（——我在沃太华大学回答听众提问讲到处时，全场爆发激烈的掌声——讲演者附注）更何况他并没有在全中国扑杀无辜人民，没有公开纵容他的“革命群众”遍设私牢，酷刑杀民，更没有公开号召大秦朝的“造反派”都起来烧和杀！

大家说，秦始皇冤枉不冤枉？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